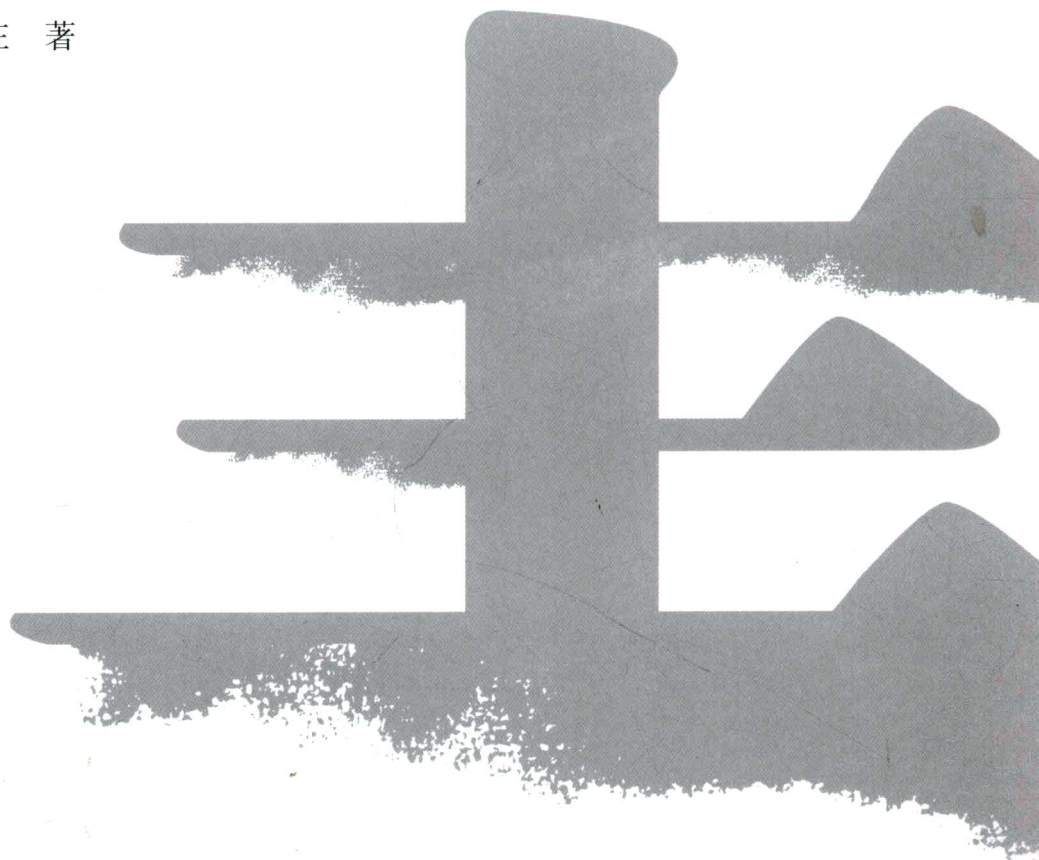


# 清代笔记、日记中的书法史料 整理与研究（上）

张小庄 著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南山博文

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生论文

# 清代笔记、日记中的书法 史料整理与研究（上）

张小庄 著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南山博文

# 总序

## 打造学院精英

当我们讲“打造中国学院的精英”之时，并不是要将学院的艺术青年培养成西方样式的翻版，培养成为少数人服务的文化贵族，培养成对中国的文化现实视而不见、与中国民众以及本土生活相脱节的一类。中国的美术学院的使命就是要重建中国学院的精英性。一个真正的中国学院必须牢牢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最深处。一个真正的学院精英必须对中国文化具有充分的自觉精神和主体意识。

当今时代，跨文化境域正深刻地叠合而成我们生存的文化背景，工业化、信息化发展深刻地影响着如今的文化生态，城市化进程深刻地提出多种类型和多种关怀指向的文化命题，市场化环境带来文化体制和身份的深刻变革，所有这一切都包裹着新时代新需求的沉甸甸的胎衣，孕育着当代视觉文化的深刻转向。今天美术学院的学科专业结构已经发生变化。从美术学院学科内部来讲，传统艺术形态的专业研究方向在持续的文化热潮中，重温深厚宏博的画论和诗学传统，一方面提出重建中国画学与书学的使命方向，另一方面以观看的存疑和诘问来追寻

绘画的直观建构的方法，形成思想与艺术的独树一帜的对话体系。与此同时，一些实验形态的艺术以人文批判的情怀涉入现实生活的肌体，显露出更为贴近生活、更为贴近媒体时尚的积极思考，迅疾成长为新的研究方向。我们努力将这些不同的研究方向置入一个人形的结构中，组织成环环相扣、共生互动的整体联系。从整个学院的学科建设来讲，除了回应和引领全球境域中生活时尚的设计艺术学科外，回应和引领城市化进程的建筑艺术学科，回应和引领媒体生活的电影学和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回应和引领艺术人文研究与传播的艺术学学科都应运而生，组成具有视觉研究特色的人文艺术学科群。将来以总体艺术关怀的基本点，还将涉入戏剧、表演等学科。面对这样众多的学科划分，建立一个通识教育的基础阶段十分重要。这种通识教育不仅要构筑一个由世界性经典文明为中心的普适性教育，还要面对始终环绕着我们的中西对话基本模式、思考“自我文明将如何保存和发展”这样一类基本命题。这种通识教育被寄望来建构一种“自我文化模式”的共同基础，本身就包含了对于强势文明一统天下的颠覆观念，而着力树立复数的今古人文的价值关联体系，完成特定文化人群的文明认同的历史教育，塑造重建文化活力的主体力量，担当起“文化熔炉”的再造使命。

马一浮先生在《对浙江大学生毕业诸生的讲演词》中说：“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从闻见得来的是知识，由自己体究，能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成立一个体系，名为思想。”孔子所谓的“知”，就是指思想而言。知、言、行，内在的是知，发于外的是言行。所以中国理学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序列及交互的生命义理。整部中国古典教育史反反复复重申的就是这个内圣外王的道理。在柏拉图那里，教育的本质就是“引导心灵转向”。这个引导心灵转向的过程，强调将心灵引向对于个别事物的理念上的超越，使之直面“事物本身”。为此必须引导心灵一步步向上，从低层次渐渐提升上去。在这过程中，提倡心灵远离事物的表象存在，去看真实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与学术研究、艺术与哲学的任务是一致的，都是教导人们面向真实，而抵达真实之途正是不断寻求“正确

的看”的过程。为此柏拉图强调“综览”，通过综览整合的方式达到真。“综览”代表了早期学院精神的古典精髓。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纵观中国艺术史，不难窥见，开时代之先的均为画家而兼画论家。一方面他们是丹青好手，甚至是世所独绝的一代大师，另一方面，是中国画论得以阐明和传承并代有发展的历史名家，是中国画史和画论的文献主角。他们同是绘画实践与理论的时代高峰的创造者。他们承接和彰显着中国绘画精神艺术相通、生生不息的伟大的通人传统。中国绘画的通人传统使我们有理由在艺术经历分科之学、以培养艺术实践与理论各具所长的专门人才为目标的今天，来重新思考艺术的教育方式及其模式建构的问题。今日分科之学的一个重大弊端就在于将“知识”分类切块，学生被特定的“块”引向不同的“类”，不同的专业方向。这种专业方向与社会真正需求者，与马一浮先生所说的“思想者”不能相通。所以，“通”始终是学院的使命。要使其相通，重在艺术的内在精神。中国人将追寻自然的自觉，衍变而成物化的精神，专注于物我一体的艺术境界，可赋予自然以人格化，亦可赋予人格以自然化，从而进一步将在山水自然中安顿自己生命的想法，发显而为“玄对山水”、以山水为美的世界，并始终铸炼着一种内修优先、精神至上的本质。所有这些关于内外能通、襟抱与绘事能通的特质，都使得中国绘画成为中国文人发露情感和胸襟的基本方式，并与文学、史学互为补益、互为彰显而相生相和。这是中国绘画源远流长的伟大的自觉，也是我们重建中国学院的精英性的一个重要起点。

在上述的这个机制设定之中，让我们仍然对某种现成化的系统感到担忧，这种系统有可能与知识的学科划分所显露出来的弊端结构性地联系在一起。如何在这样一个不可回避的学科框架中，有效地解决个性开启与共性需求、人文创意与知识学基础之间的矛盾，就是要不断地从精神上回返早期学院那种师生“同游”的关系。中国文化是强调“心游”的文化。“游”从水从流，一如旌旗的流苏，指不同的东西以原样来相伴相行，并始终保持自己。中国古典书院，历史上的文人雅集，都带着这种“曲水流觞”、与天地同游的心灵沟通的方式。欧洲美术学院有史以来所不断实践着的工作室体制，在经历了包豪

斯的作坊系统的改革之后，持续容纳新的内涵，可以寄予希望构成这种“同游”的心灵濡染、个性开启的基本方式，为学子们提高自我的感受能力、亲历艺术家的意义，提供一个较少拘束、持续发展的平台。回返早期学院“同游”的状态，还在于尽可能避免实践类技艺传授中的“风格”定势，使学生在今古人文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中，广采博集，发挥艺术的独特心灵智性的作用，改变简单意义上的一味颠覆的草莽形象，建造学院的真正的精英性。

随着经济外向度的不断提高，多种文化互为交叠、互为楔入，我们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跨文化的环境。在这样的跨文化境域中，中国文化主体精神的重建和深化尤为重要。这种主体精神不是近代历史上“中西之辩”中的那个“中”。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域概念，既包含了中国文化的根源性因素，也包含了近现代史上不断融入中国的世界优秀文化；它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概念，既包含了悠远而伟大的传统，也包含了在社会生活中生生不息地涌现着的文化现实；它亦不是简单的整体论意义上的价值观念，不是那些所谓表意的、线性东方符号式的东西。它是中国人创生新事物之时在根蒂处的智性品质，是那种直面现实、激活历史的创生力量。那么这种根源性在哪里？我想首先在中国文化的典籍之中。我们强调对文化经典的深度阅读，强调对美术原典的深度阅读。潘天寿先生一代在上世纪50年代建立起来的临摹课，正是这样一种有益的原典阅读。我原也不理解这种临摹的方法，直至今日，才慢慢嚼出其中的深义。这种临摹课不仅有利于中国画系的教学，还应当在一定程度上用于更广泛的基础课程。中国文化的根性隐在经典之中，深度阅读经典正是意味着这种根性并不简单而现成地“在”经典之中，而且还在我们当代人对经典的体验与洞察，以及这种洞察与深隐其中的根性相互开启和砥砺的那种情态之中。中国文化主体精神的缺失，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经典的失落，而是我们对经典缺少那种充满自信和自省的洞察。

学院的通境不仅仅在于通识基础的课程模式设置。这一基础设置涵盖本民族的经典文明与世界性的经典文明，并以原典导读和通史了解相结合的方式继承中国的“经史传统”，建构起“自我文化模式”的自觉意识。学院的通境也不仅仅在

于学院内部学科专业之间通过一定的结构模式，形成一种环环相扣的链状关系，让学生对于这个结构本身有感觉，由此体味艺术创造与艺术个性之间某些基本的问题，心存一种“格”的意念，抛却先在的定见，在自己所应该“在”的地方来充实而完满地呈现自己。学院的通境也不仅仅在于特色化校园建造和校园山水的濡染。今天，在自然离我们远去的时代，校园山水的意义，是在坚硬致密的学科见识中，在建筑物内的漫游生活中，不断地回望青山，我们在那里朝朝暮暮地与生活的自然会面。学子们正是在这样的远望和自照之中，随师友同游，不断感悟到一个远方的“自己”。学院的通境更在于消解学院的藩篱，尽可能让“家园”与“江湖”相通，让理论与实践相通，让学院内外的艺术思考努力相通。学院的精英性绝不是家园的贵族化，而是某种学术谱系的精神特性。这种特性有所为有所不为，但并不禁锢。她常常从生活中，从艺术种种的实验形态中吸取养料。她始终支持和赞助具有独立眼光和见解的艺术研究，支持和赞助向未知领域拓展的勇气和努力。她甚至应当拥有一种让艺术的最新思考尽早在教学中得以传播的体制。她本质上是面向大众、面向民间的，但她也始终不渝地背负一种自我铸造的要求，一种精英的责任。

在学院80周年庆典到来之际，我们将近年来学院各学科的部分博士论文收集起来，编辑了这本丛书，题为“南山博文”。丛书中有获得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荣誉的论文，有我院率先进行的实践类理论研究博士的论文。论文所涉及的内容范围很广，有历史原典的研究，有方法论的探讨，有文化比较的课题。这套书的出版中满含青年艺术家的努力，凝聚导师辅导的心血，更凸显了一个中国学院塑造自我精英性的决心和独特悠长的精神气息。

谨以此文献给“南山博文”首批丛书的出版，并愿学院诸子：心怀人文志，同游天地间。

许江

2008年3月8日

于北京新大都宾馆

# 序

昔贤王仲仁有言：“命，吉凶之主也，自然之道，适偶之数，非有他气旁物厌胜感动使之然也。”是故，高才洁行，适遇命恶，退在下流；薄能浊操，偶遇命善，不列卑贱。况乎常人之性，不喜胜己，故以大才干小才，小才不能受，遇而不合；即以大才之士，干大才之主，不容者亦何可胜数。又有顺风前程，升迁在即，忽罹绝症，顿失良机。凡此种种，何莫非命，固余“不可预测之谓命”说之所由出也。

张君小庄，清真君子也，下帷攻苦，多沉郁之思。常与细论艺文，时或默然如愚，若于吾言不之闻也，盖其倏忽间思通万里，不顷刻而新见出焉，余心颇奇之。阅两年，张君持所为《清代笔记、日记中的书法史料整理与研究》问序。观其爬梳抉剔，寻幽发微，岿然钜制，于躁急之世，成此沉潜之书，益见其整齐故事之力，感不绝于余心。

余观夫古今之书，非作即述。以张君之慧，不难于作；其博识，亦不难于述。古之作者，已让张君为述者地。张君亦不敢尽出其心手，是以作者之心，为述者之事，以述者之迹，寄作者之心，为作者地，自知之明也。入无所不取，取无所不得，其一往深情，真有出乎述者之外矣。许江院长以“掘得大金矿”称扬之，良有以也。

大抵密静者多内力，无功利心者内力聚。其发为文章，真功利亦随以生，其功在学术，而利于学子，此张君之功利也。

君非世外人，其志大，或时有不遇之感，惟辄能自省体认，此余所以有篇首数语之感叹。今更为君曰：以孔门高弟子夏之贤，犹不免出见纷华而悦，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不能自决。况吾与子之不及夏之远甚耶。《西厢记》唱辞“幽僻处可有人行”，愿与张君共勉焉。

2011年10月 章祖安序于杭州



大抵密靜者多內力，而功利心者由力聚其費為文章，真功<sub>利</sub>力亦  
隨以生，其功在學術而利于學子，此則張君之功利也。

君視世人其志大，或時有不遇之感，性輒能自省，體認此余所  
以有篇首數語之感嘆。今更為君曰：以孔門高弟子夏之

賢，猶不免出見<sub>於</sub>華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不能  
自決，况吾与子之不及夏之遠甚邪！西廂記唱辭：幽僻處可

有<sub>於</sub>此，願与張君共勉焉。二零二年十月章祖安序于杭州。



章祖安序手迹（局部）

# 目 录

总 序		
打造学院精英		i
序		vii
上编 清代笔记、日记中的书法史料价值		
引 言		1
第一章 书家传记		4
一 亲历亲闻的传记史料		4
二 遗闻轶事类传记史料		18
三 转录前人的传记史料		22
第二章 书法论评		26
一 论书家书迹		26
二 论临习创作		46
三 论书学源流		55
第三章 碑帖鉴藏		62
一 鉴赏考订		62
二 收藏著录		71
馀 论		87
附文一：杨宾《杨子日记》		89
附文二：李鸿裔《苏邻日记》、《靠苍阁日记》		96
附文三：吴大澂《愔斋日记》		104

附文四：袁昶《毗邪台山散人日记》	106
一 论清代书法	107
二 论南北朝、隋碑刻	120
三 论唐宋书法	124
四 论书法创作技法	128
五 考证鉴赏	131
六 录他人论书语	133
结 语	135

## 下编 清代笔记、日记书法史料汇编

凡 例	139
孙奇逢《孙征君日谱录存》	140
梁维枢《玉剑尊闻》	141
孙承泽《春明梦馀录》	144
谈迁《枣林杂俎》	147
谈迁《北游录》	149
徐树丕《识小录》	156
冯班《钝吟杂录》	158
梁清远《雕丘杂录》	161
冒襄《影梅庵忆语》	165
周亮工《闽小纪》	166
周亮工《因树屋书影》	167
刘体仁《七颂堂识小录》	171
顾炎武《日知录》	174
姜绍书《韵石斋笔谈》	179
余怀《板桥杂记》	185
余怀《东山谈苑》	186
尤侗《良斋杂说》	187
王弘撰《山志》	190
曹家驹《说梦》	198
李延昉《南吴旧话录》	200
刘銮《五石瓠》	203
姜宸英《湛园札记》	204
赵吉士《寄园寄所寄》	206
屈大均《广东新语》	208

宋起凤《稗说》	214
王士禛《池北偶谈》	217
王士禛《居易录》	226
王士禛《香祖笔记》	237
王士禛《分甘馀话》	241
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	243
宋荦《筠廊偶笔》	245
宋荦《迎銮日记》	248
阎若璩《潜邱札记》	250
张英《聪训斋语》	252
万斯同《群书疑辨》	254
钮琇《觚剩》	271
靳治荆《思旧录》	272
高士奇《蓬山密记》	273
刘献廷《广阳杂记》	274
陈奕禧《皋兰载笔》	278
褚人获《坚瓠集》	279
杨宾《杨子日记》	282
杨宾《杨大瓢先生杂文残稿》	290
查慎行《得树楼杂钞》	291
张潮《虞初新志》	293
张伯行《养正类编》	294
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	295
徐用锡《字学札记》	296
金埴《巾箱说》、《不下带编》	299
徐文靖《管城硕记》	302
刘廷玑《在园杂志》	303
王棠《燕在阁知新录》	305
孔毓埏《拾箴馀闲》	311
佟赋伟《二楼纪略》	312
裘君弘《妙贯堂馀谭》	313
纳兰揆叙《隙光亭杂识》	315
沈炳巽《权斋老人笔记》	319
王应奎《柳南随笔》	320
杭世骏《订讹类编》	323
袁栋《书隐丛说》	325

姚范《援鹑堂笔记》	329
龚炜《巢林笔谈》	330
江昱《潇湘听雨录》	331
鲍倚云《退馀丛话》	336
汪师韩《韩门缀学》	337
袁枚《随园随笔》	341
卢文弨《钟山札记》	343
朱琰《金粟逸人逸事》	345
盛百二《柚堂笔谈》	346
王鸣盛《蛾术编》	347
梁同书《日贯斋涂说》	349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	350
阮葵生《茶馀客话》	352
汪启淑《水曹清暇录》	362
钱大昕《竹汀先生日记钞》	364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	366
赵翼《陔馀丛考》	368
周广业《过夏杂录》	370
周广业《循陔纂闻》	379
姚鼐《惜抱轩笔记》	381
胡承谱《只麈谭》	383
吴騫《尖阳丛笔》	386
翁方纲《石洲诗话》	391
陈锡路《黄妳馀话》	392
沈初《西清笔记》	393
桂馥《札朴》	397
孙志祖《读书脞录》	403
蔡澄《鸡窗丛话》	405
顾瑛《觉非盦笔记》	408
黄易《嵩洛访碑日记》	412
黄易《岱岩访古日记》	415
梁玉绳《瞥记》	416
梁玉绳《庭立记闻》	417
洪亮吉《北江诗话》	419
王宗敬《我暇编》	420
李麇芸《炳烛编》	422

余金《熙朝新语》	423
陆烜《梅谷偶笔》	424
钱泳《履园丛话》	426
赵慎畛《榆巢杂识》	445
焦循《忆书》	449
阮元《石渠随笔》	451
阮元《小沧浪笔谈》	458
阮元《广陵诗事》	467
阮元《定香亭笔谈》	468
诸联《明斋小识》	470
郭麐《樗园销夏录》	471
吴德旋《初月楼闻见录》	472
蒋阶《甦馀日记》	478
周中孚《郑堂札记》	479
英和《恩福堂笔记》	480
陆继辂《合肥学舍札记》	483
邓廷桢《双砚斋笔记》	484
梁章钜《南省公馀录》	487
梁章钜《退庵随笔》	490
梁章钜《归田琐记》	491
梁章钜《浪迹丛谈》	493
昭槤《啸亭杂录》	497
胡尔荣《破铁网》	500
姚元之《竹叶亭杂记》	502
郑光祖《一斑录杂述》	506
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	508
杨夔生《匏园掌录》	510
姚衡《寒秀草堂笔记》	511
沈涛《铜熨斗斋随笔》	524
郑复光《费隐与知录》	525
王培荀《听雨楼随笔》	528
王培荀《乡园忆旧录》	529
吕世宜《爱吾庐笔记》	540
张祥河《关陇輿中偶忆编》	542
沈兆沅《篷窗附录》	545
方士淦《蔗馀偶笔》	546

叶廷琯《吹网录》	547
叶廷琯《鸥陂渔话》	550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	555
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	560
祁寯藻《祁寯藻日记》	564
程庭鹭《多暇录》	565
甘熙《白下琐言》	567
何绍基《蛾叟乙未归湘日记》	570
何绍基《何蛾叟日记》	572
何绍基《蛾叟日记摘钞》	578
不著撰人《蜨阶外史》	580
陆以湑《冷庐杂识》	582
齐学裘《见闻随笔》	585
韩泰华《无事为福斋随笔》	622
叶名沆《桥西杂记》	624
许宗衡《玉井山馆笔记》	627
毛祥麟《墨馀录》	629
陈其元《庸闲斋笔记》	630
顾文彬《过云楼日记》	633
蒋光煦《东湖丛记》	634
陈介祺《陈簠斋笔记》	643
徐时栋《烟屿楼读书志》	644
徐时栋《烟屿楼笔记》	646
周寿昌《思益堂日札》	647
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	650
汪鋈《十二砚斋随录》	652
刘禧延《刘氏遗著》	654
刘因之《谰言琐记》	655
蒋超伯《麓澹荟录》	656
蒋超伯《南溟楷语》	657
俞樾《九九销夏录》	659
俞樾《春在堂随笔》	662
孙文川《淞南随笔》	664
汪璩《随山馆尺牋》	666
王韬《瀛壖杂志》	668
王韬《蘅华馆日记》	672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	673
方濬师《蕉轩随录》	676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	679
褚成博《褚伯约日记》	683
李鸿裔《苏邻日记》	684
李鸿裔《靠苍阁日记》	689
平步青《霞外攬屑》	692
丁丙《北隅綴录》	695
谭献《复堂日记》	696
周星诒《麻横日记钞》	699
王闾运《湘绮楼日记》	702
吴大澂《愙斋日记》	703
吴大澂《恒轩日记》	706
吴大澂《皇华纪程》	707
张荫桓《三洲日记》	708
丁柔克《柳弧》	709
陈康祺《郎潜纪闻》	711
金武祥《粟香随笔》	718
缪荃孙《云自在龕随笔》	726
袁昶《毗邪台山散人日记》	734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	772
徐琪《南斋日记》	785
桐西漫士《听雨闲谈》	786
黄协坝《淞南梦影录》	787
文廷式《纯常子枝语》	788
丁国钧《荷香馆琐言》	792
震钧《天咫偶闻》	794
王伯恭《蜷庐随笔》	802
况周颐《蕙风簃随笔》	805
汪康年《汪穰卿笔记》	807
严修《蟬香馆使黔日记》	810
郑孝胥《郑孝胥日记》	811
梁启超《双涛阁日记》	817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	818



# 引言

作为文献史料而言，笔记、日记是历史文献学研究的重要对象。

笔记一体，始于汉魏，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古代笔记，存世甚夥，以数量而论，又尤以清代为多。笔记的“出身”不贵，“小说家流（按：在古代，笔记与小说往往合称，归于一类），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sup>1</sup>，作为野史稗乘，于作者于读者往往都只是用来消闲遣日而已。笔记的身份虽“野”，但从史料学的角度，却自有正史所不可替代的价值。由于笔记内容庞杂，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这就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资源，进而扩充了官修正史所载的历史内容。笔记中常有关于作者亲身所闻所见的记述，此种史料因系亲历而具有较高的真实性，有时又能起到补正史之阙的作用。

日记萌发于汉，兴起于唐宋，衰落于元，而鼎盛于明清，其发展情况与笔记大致相同。作为史料而言，日记与笔记有着较为类似的特点。在内容上，日记亦是包罗万象，无所不记，如记事日记、学术日记、出使日记、出征日记、纪游日记等，即是据其内容而所作的类型划分。一般而言，日记大都是写给自己看的，主观上并无公开的愿望（也有的日记，作者撰写的本意即是要示之于人，如李慈铭《越縕堂日记》），故其所记的真实可靠性，甚至更要在笔记之上。日记中记述人、事较注重细节，且系有年月日，此种史料既具体而又有时间性，诚为